数字人文与清史研究

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与官员群体研究

任玉雪　陈必佳　郝小雯　康文林　李中清

［**摘要**］本文主要介绍基于清代缙绅录构建大规模量化数据库的步骤和初步成果，并探讨利用历史大数据定量分析的方法研究清代官员群体的独特优势和潜力。清代缙绅录记载了中央及地方文武职官员的基本信息，每年四季出版。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基于《清代缙绅录集成》的部分约有 280 万条记录，如果将研究组目前整理的海内外其他图书馆所藏缙绅录版本统计在内，总数据量或可达到 500 万条以上。目前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构建初具雏形，可以支持系统的定量分析。更为重要的是，经验证，缙绅录量化数据库可与基于朱卷、题名录、同年齿录等其他相关史料构建的量化数据库进行匹配连接，具有成为研究清代官员群体及士人阶层最全面、系统、基础的核心量化数据库的巨大潜力。最后，以探讨考试、财富和旗人身份三种不同因素对仕途的影响为例，本文展示了利用量化数据库进行研究分析的可能方向。

［**关键词**］清代　缙绅录　量化数据库　官员群体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16）－04－0061－17

官员群体及选任制度向来受到学界的重视，就清代而言，以往的研究多从官制、科举、捐纳等各方面进行探讨，成果卓越，但缺乏基于科举史料以外的大规模数据库为基础的定量分析研究。清代保留至今的缙绅录文献规模浩大，提供了连续性的官员记录，是建立清代官员群体的大规模历史量化数据库的理想史料。①李中清—康文林研究组希望进行新的尝试——创建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并与题名录、朱卷、乡试录、同年齿录、捐纳名录等史料构建的量化数据库匹配连接，整合尽可能多的官员背景信息，将定量分析与传统史学方法相结合，考察清代官员群体，

［**收稿日期**］2016－04－22

［**作者简介**］任玉雪（1972－），女，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上海 200240，renyuxue@ sjtu. edu. cn；陈必佳（1991－），女，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科学部博士生，香港，bchenag@ connect. ust. hk；郝小雯（1991－），女，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学硕士，香港，xhaoab@ connect. ust. hk；康文林（1967－），男，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科学部教授，香港，camcam@ ust. hk；李中清（1952－），男，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座教授，香港，jqljzl@ ust. hk

［**基金项目**］香港研究资助局（The Research Grants Council），“Spatial，Temporal，and Social Network Influences on Officials’ Careers during the Qing：Creation and Analysis of a National Datebase from the jinshen lu，2014－2016”，HK PGC GRF 16400114，PI：Cameron Campbell.

① 案：量化数据库及其相关的定量研究是统指整理涵盖一定地域范围、时间跨度的大规模个人或微观信息的系统资料以构建适用定量统计数据库结构并进行分析的一种研究范式。量化数据库有别于传统的扫描文本数据库，可以直接支持对各种人口和社会行为进行统计描述及彼此间相互关联的分析，使学者可以依托数据库理解个体是如何被宏观社会环境所规范和影响的，也可以理解这些微观、个体行为又如何集合起来塑造和改变宏观社会进程，甚至可以用来检验“中观”社会群体，如家族、邻里社区等在宏观环境和微观行为互动下的特点和作用。参见梁晨、董浩、李中清：《量化数据库与历史研究》，《历史研究》2015 年第 2 期。

以及考试、财富与旗人身份等多方面因素对其仕途的影响。本文将主要介绍量化数据库创建的进展、数据质量与潜力。

一、构建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计划的缘起

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构建的初衷，是探讨考试、财富和旗人身份三种不同因素对于官员群体仕途的影响。清代官员群体与社会流动一直是中国历史研究的焦点之一，成果颇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利用登科录、朱卷、题名录、同年齿录等与科举相关的历史材料建立数据库，将社会学方法与制度史研究相结合，讨论科举人物的家庭背景与社会来源，进而研究社会流动性问题。① 这些研究在运用史学传统方法的基础上融合了社会科学的定量统计方法，促进了史学研究的巨大进步。然而囿于资料与相关统计软件应用方面的限制，以往研究使用的样本数量在四万名之内②，与四十多万的清代官员群体相比略显薄弱③。此外，以往关于清代社会流动的讨论，大部分都集中在有进士、举人、贡生等科名的民人群体，对旗人的关注很少。根据量化数据库已录入的 65 万条记录估算④，旗人在官员群体总数中虽然仅占约 23%，却在一至三品的高品级官员中占据绝对优势，约近 60%（详见表 7、表 8 及后文详细论述）。因此，旗人在官员群体中的位置和作用至关重要，对于理解清代社会流动不容忽视，而缙绅录量化数据库的建立为全面系统地理解清代社会流动提供了更多可能。

其二，财富对官员入仕资格和升迁的影响，既往的研究主要讨论捐纳制度与官员出身、任官、铨选、晋升等资格的获得⑤，在厘清捐纳制度方面有很多精彩的论述，但缺乏对捐纳官员仕途发展的讨论。一般认为，通过捐纳进入仕途的官员并非来自擅长考取科举功名的家族，财富是他们入仕的唯一途径，张乐翔（Lawrence L. C. Zhang）则认为通过捐纳入仕与通过科举入仕的官员实际上来自同一群体，捐纳与科举对其而言不过是入仕的不同途径。⑥ 我们将目前录入的缙

---

① 潘光旦、费孝通：《科举与社会流动》，《社会科学》1947 年第 4 卷第 1 期；何炳棣著：《明清社会史论》，徐泓译注，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Benjamin A. Elman，"Social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 via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0：1（Feb，1991），pp. 7－28；Benjamin A. Elman，*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Benjamin A. Elman，*Civil Examinations and Meritocrac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3；张杰：《清代科举家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郑若玲：《科举、高考与社会之关第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相关成果众多，此不一一赘述。

② 案：何柄棣在《明清社会史论》中，统计的样本约为三万五千人，其中进士一万四五千人，举人、贡生约二万余名。参见《明清社会史论》，徐泓序，第 xviii 页；

③ 四十万的数目是保守的粗略估计，基于我们目前录入了四分之一的《清代缙绅录集成》记录（目前仅录入文职官员的信息），共计 14 万多名官员，考虑到部分已录入的缙绅录版本季节分布较为稀疏，我们估计清代官员的总人数约在四十多万。

④ 估算是按照"记录"统计的，一条"记录"是指缙绅录文献中每人次的信息。

⑤ 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 40 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 年；艾永明：《清朝文官制度》，商务印书馆，2003 年，第 57—125 页；王志明：《雍正朝官员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 313—353 页；伍跃：《中国的捐纳制度与社会》，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年。Lawrence L. C. Zhang，"Legacy of Success：Office Purchase and State－Elite Relationship in Qing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73：2，（Dec 2013），pp. 259－97；Lawrence L. C. Zhang，*Legitimacy and Legacy*：*Sale of Offices and State－Elite Partnership in Late Imperial China*（working title）. Book manuscript.

⑥ Lawrence L. C. Zhang，"Legacy of Success：Office Purchase and State－Elite Relations in Qing China"，*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 73 No. 2（December 2013），pp. 259－297.

绅录量化数据库与他录入的《川楚事例文武官生名次全录》连接后，发现捐纳人员大多来自有进士、贡生等科名的家族，验证了他的观点。① 随着量化数据库的扩展，研究组会继续关注科举与财富对官员仕途的影响。

其三，以往关于旗人身份对官员仕途影响的研究，以讨论官缺制度对旗人入仕、升迁机会的影响为主。② 还有学者利用地方志材料，建立地方基层官员数据库，进行旗、民官员的出身、任期、任地、升黜等问题的分类讨论。③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计算机技术还比较薄弱的情况下，作者基于数据库的分析难能可贵，但研究还仅限于简单的分类讨论。实际上，通过新构建的缙绅录量化数据库，我们发现在京师的中央机构中，除了旗人官缺的影响，主要部院衙门的高品级官员中旗人往往占到三分之二，低品级的笔帖式、库使等官职基本都为旗人所垄断（详见表6）。可见，缙绅录量化数据库的建设，使大规模系统化地分析不同机构的官员构成与职责分野之间的关系成为可能，在继承和验证以往学术成果的同时，还能考量官员构成等方面长时段的发展变化，大大拓宽了我们的研究视野。

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中不仅包含了有科名的官员，还包括大量承袭爵位以及通过捐纳等异途入仕的官员、吏员，同时也有从武职系统进入文职系统的情况。由于材料和研究方法的局限，以往对清代官僚群体社会流动的研究过分依赖科举相关的材料，侧重考察拥有科举功名的阶层来源于平民家庭或家族的比例，仅以此来估量社会精英阶层的开放性，而忽视了在清代官僚体系中占有更主导地位的旗人。从目前缙绅录数据录入的情况来看，出身八旗的官员约占整个官员群体的五分之一以上。通过建设缙绅录量化数据库，我们可以用定量的方法分析官僚群体在时空上的变化，重新审视通过科举入仕的民人官员在清代官僚系统中的地位，以及财富、旗人身份在入仕资格及升迁过程中的影响。

清代有一套复杂而完善的文官制度，有效控制着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文官群体，但将清代文官群体与其他国家文官群体进行比较的研究暂付阙如。尽管由于各国官僚制度植根于具体的国情，很难比较优劣，但可以通过对官员来源、结构与流动性的考察，研究不同国家官员管理的效率与公平问题。目前，已有学者进行类似的研究，例如 Thomas A. DiPrete 对美国官员体系的探讨④。我们希望通过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的创立及开展的相关研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官员群体与管理制度的比较研究，并结合管理学的视角和历史经验，对官僚制度和管理理论提出新的观点。

现存的清代缙绅录文献规模庞大，每种缙绅录几乎覆盖了当时所有的文职官员和部分八旗驻防官员，内容简洁、条目化、全覆盖，并且具有持续性的特征，非常适合建立长时段、大样本的量化数据库。此外，缙绅录量化数据库能与其他史料建立的数据库通过匹配连接扩充内容上的不

---

① 感谢香港科技大学助理教授张乐翔与我们分享他的数据。

② 王钟翰：《清代官制简述》，《王钟翰清史研究论集》（第四册），中华书局，2004 年，第 2104—2133 页；杜家骥：《清代八旗官制与行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年；张宝林：《清代官缺制度》，《黑龙江史志》2013 年第 10 期；何平：《清代的官缺制度》，《文史杂志》1990 年第 1 期。汪琳岚：《清代皇族成员的先赋身份与官职获得：1644—1911》，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2。

③ 李国祁：《清代基层地方官人事嬗递现象之量化分析》，“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丛书第七种，“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印行，1975 年。魏秀梅系列论文主要发表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上，如下：《从量的观察探讨清季布政使的人事嬗递现象》（第二期，1971 年 6 月），第 505 页；《从量的观察探讨清季按察使的人事嬗递现象》（第三期下册，1972 年 12 月），第 456 页；《从量的观察探讨清季督抚的人事嬗递》（第四期上册，1973 年 5 月），第 263—295 页；《从量的观察探讨清季学政的人事嬗递》（第五期，1976 年 6 月），第 92—117 页；《从量的观察探讨清季驻防将军都统之人事嬗递》（第十期，1981 年 7 月），第 184 页—223 页；《从量的观察探讨清季驻防副都统之人事嬗递》（第十三期，1984 年 6 月），第 384—426 页。

④ Thomas A. DiPrete, *The Bureaucratic Labor Market: The Case of the Federal Civil Service*. Vancouver: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2013.

足，增强其数据分析的潜力。传统的史学方法很难处理数量庞大的数据，李中清—康文林研究组希望以《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为核心基础量化数据库，将定量分析方法和传统史学方法相结合，尝试在大规模系统个体数据的基础上，以分析考试、财富与旗人身份等三种不同因素对清代官员仕途的影响为起点，重新审视清代上层社会的开放性与流动性。此外，以往的制度史研究主要以典章制度为主，忽略了制度规则之下人的因素，即官员群体。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的构建，将可以把制度变迁与官员群体的变化结合起来，考察制度与人之间的相互塑造。

从历史文献价值的角度来说，缙绅录的优点和缺点都是显而易见的。缙绅录每季推新，涵盖全国的绝大多数官员和吏员，由此形成连续的官与吏的名册，与登科录、朱卷、题名录、同年齿录和官员履历档案等史料相比，缙绅录覆盖的官员数量显然要多得多，受到著名清史专家冯尔康的极力称赞①，何炳棣、瞿同祖、张仲礼等学者在讨论清代官员的社会结构时，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缙绅录②，历史学家往往利用缙绅录探讨职官和行政区划变迁③。缙绅录史料的缺点也是比较明显，一些信息登记的滞后和错误无法避免。历史学往往利用考据方法纠正史料错误，但由于时间和人力成本，传统的考据方法在处理海量数据的时候会显得力不从心。

根据缙绅录每季连续出版的特点，构建量化数据库既可以由录入人员对相邻版本的数据进行逐条的核对，又可以快速、全面地核查已录入信息中出现的问题，从而可以及时发现史料录入的错误或疑点并反馈给录入人员进行处理。此外，研究组还特别注意多种史料的利用和互订，将缙绅录与题名录、登科录、朱卷等数据库进行连接，实现相互纠错。最后，大规模的数据分析，有一定的容错率，少量信息局部的偏差不会影响我们最后整体结论的有效性。总而言之，缙绅录项目组将利用定量分析和传统史学考证相结合的方法，尽力降低史料失实和录入错误对研究结果产生的影响。

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④缘起自 2012 年冬，任玉雪等人⑤将《清代缙绅录集成》中东北地区的官员录入为量化数据库，发现清代官员的流动性很大，仅录入东北地区的官员难以追踪官员的仕途变化，因此产生了将现存的缙绅录全部录入的想法。2013 年夏，康文林到上海交通大学开办暑期学校期间，通过和任玉雪的交流，敏锐地意识到缙绅录材料的重大研究价值，马上和李中清讨论全部录入的可能性，随后积极投入相关课题申请并于 2014 年获得香港研究资助局的立项经费。

二、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的文献来源及录入进度

缙绅录是记录职官的职掌、姓名、出身、籍贯、字号等基本情况的专书，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宋的《班朝录》，在明朝已颇为流行。⑥ 清代继承了出版官吏名册的传统，缙绅录成为记录全国职官信息最全面、系统的资料。

---

① 冯尔康：《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 年，第 568 页。

② 何炳棣著：《明清社会史论》，徐泓译注；瞿同祖著：《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 年；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

③ 关晓红：《清季府厅州县改制》，《学术研究》2011 年第 9 期；胡恒：《皇权不下县？清代县辖政区与基层社会治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333 页。

④ 清代缙绅录数据库项目是李中清 – 康文林研究团队关于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四个阶段”研究课题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研究项目的主要目标是根据清代缙绅录的史料特点，建设量化数据库，分析不同因素对清代官员仕途的影响。

⑤ 非常感谢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的武洋同学和中国东北历史与社会研究中心的助理徐丹的积极努力。

⑥ 张英宇：《清代搢绅录略考》，《文献》1984 年第 1 期；阚红柳：《清代缙绅录的内容、特点与史料价值探析》，《清史研究》2012 年第 2 期。

如果从发行者的角度来区分，缙绅录可分为官刻本和坊刻本，官刻本一般是吏部进呈的本子，坊刻本则是由京城的书铺出版的；如果从内容来看，还可以分为文缙绅和武缙绅。如果不是特别说明，本文提到的缙绅录是指文缙绅；如果按照发行的时间区分，缙绅录每季推新，分为春、夏、秋、冬四部，如此循环往复。这里的季节是指缙绅录的出版时间。

缙绅录的官刻本是吏部进呈的本子，一般称为《爵秩全览》，清末也有称《职官录》。有人认为官刻本数量较少，民间不易获得，遂致坊刻本盛行①。也有学者认为官刻本的发行可能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后，由吏、兵二部收集信息，成书后称为《爵秩全览》，在立春、立夏、立秋和立冬进呈御览，并在坊间出售。但官刻本可能亦由书坊制作，由吏部监督完成。坊刻本与官刻本之间的信息可能是互通的。② 但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爵秩全览》都是官刻本，荣宝斋、荣禄堂、荣锦堂等一些书铺也出版一些名为《爵秩全览》的坊刻本。除此之外，坊刻本还有众多其他名称，在题签、内封或版心处，常常可以看到“大清搢绅全书”、“大清缙绅全书”、“满汉搢绅全本”、“爵秩全函”、“缙绅”、“爵秩全览”、“大清中枢备览”和“爵秩新本”等名称。③

保留至今的缙绅录规模庞大，仅《清代缙绅录集成》中已收录的便有200余种。④ 项目组在此基础上借助互联网对海内外各大图书馆所藏缙绅录进行了更为全面的查询和整理，目前已搜索到2700余种，其中包括大量重复和季节不明的版本。⑤ 如果按照年代和季节排除重本，目前能够确定至少现存402种不同时间点的缙绅录，根据获取资料的难易程度及馆藏缙绅录的稀有程度，研究组对录入材料的优先级别进行了排序，详见表1。

由表1可见，在材料获取方面，《清代缙绅录集成》的出版为研究者利用清华大学图书馆馆藏缙绅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是项目组目前最为主要、录入优先级别最高的材料来源。

不过，在互联网时代，史学工作者获取研究材料的方式已非常多样，除前往特定图书馆借阅传统的纸本书外，还可通过丰富的网络数字资源获取材料⑥。随着史料搜集工作的推进，项目组逐渐发现了大量在互联网上公开可用的缙绅录。例如，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藏160余种缙绅录中，有120多种可供读者在图书馆网站免费下载彩色电子版；美国国会图书馆有23种缙绅录可在网上阅览；京都大学图书馆网站可阅读雍正二年的孤本；中国国家国家图书馆馆藏近300种缙绅录中，也有10种顺治朝至乾隆朝的善本可通过“中华古籍资源库”浏览。⑦

---

① 松竹斋、荣宝斋：《爵秩全览》，甲午夏季（光绪二十年夏），载于清华大学图书馆，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编：《清代缙绅录集成》（55），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176页。

② 刘铮云：《按季进呈御览与清代缙绅录的刊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7本第2分，2016年6月。

③ 案：本文统一称为“缙绅录”。

④ 案：在《清代缙绅录集成》的出版说明可见，《集成》共汇集了209种缙绅录，但在《集成》的目录中，仅查到207种，而且目录中列出的嘉庆十九年冬版本，在正文没有，因此《集成》共收录了206种；对于各大主要图书馆馆藏数量和最早季节种类的统计，详见刘铮云上文。

⑤ 目前已查阅的大陆地区图书馆包括中国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及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河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吉林大学、辽宁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宁夏大学、清华大学（按照清华大学出版的《清代缙绅录集成》统计）、山东大学、四川大学、苏州大学、郑州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的图书馆；大陆以外的图书馆包括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华盛顿中国研究材料中心、哥伦比亚大学、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库、京都大学、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等等。以上大陆地区各大图书馆缙绅录馆藏的统计信息主要来源于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李荣倩同学的细致工作，台湾地区及海外各图书馆馆藏的搜集整理工作由郝小雯同学完成，进一步的统计工作仍在进行中。

⑥ 关于互联网时代的历史教研，参见梁晨、董浩、李中清：《互联网时代的历史教研新动向探微》，待刊稿。

⑦ 在此感谢张乐翔对于海外各图书馆馆藏刊本及电子资源的提示。

表 1　缙绅录（含民国）馆藏数量、独有数量与录入优先级统计表

图书馆	优先级	总量（种）	独有数量（种）
《清代缙绅录集成》	1	206	181
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	2	163	53
美国国会图书馆	3	23	3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	4	178	43
美国华盛顿中国研究材料中心	5	261	8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馆	6	113	17
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	7	12	1
日本东洋文库	8	89	11
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	9	70	1
上海图书馆	10	146	8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11	96	5
中国国家图书馆	12	297	22
北京大学图书馆	13	493	34
清华大学图书馆	14	66	10
南开大学图书馆	15	8	1
吉林大学图书馆	16	60	1
南京图书馆	17	131	2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18	5	0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19	154	0
中山大学图书馆	20	16	0
复旦大学图书馆	21	22	0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22	38	0
苏州大学图书馆	23	17	0
山东大学图书馆	24	9	0
其他		67	1
总计		2740	402

说明：1、在统计不同时间点的缙绅录数量时，暂不考虑书坊和官、坊刻本的区别，例如，如果某年某季有两种及以上不同书坊或不同名称的缙绅录，在此记为一种。另外，对季节不明的版本采取了如下处理方式：同一年若无确定季节的版本，而有一册或多册季节不明的版本，则将本年不同时间点的缙绅录的数量统计为 1；同一年若有确定季节的版本，则不将季节不明的版本统计在内，因为有可能与确定季节的版本重复。2、独有数量指未收藏于更高优先级图书馆中的缙绅录种数。同样，此处仅统计不同时间的缙绅录种数，暂不考虑书坊和官、坊刻本的区别。

除了新兴的网络数字资源，相对传统的微缩胶卷也使得研究者无需远涉重洋即可阅读现存海外的史料：例如，香港大学图书馆不仅存有美国的华盛顿中国研究材料中心录制的 260 余种缙绅录的胶卷，还可供读者免费复制；又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馆藏的 170 余种缙绅录，在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存有胶卷。此外，项目组也在采用传统的方式前往国内各大图书馆查阅和复制材料，目前已斥资复制了上海图书馆的数本缙绅录。与此同时，项目组还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等处联络，商讨扫描或复制的可能，得到了各方的积极回应与帮助。①

未来随着项目组按照季节排查版本工作的推进，将能确定更多不同时间点的缙绅录。根据项目组已录入的数据来看，每种缙绅录职官的记录数量约为 1. 3 到 1. 5 万，由此估计，各大图书馆馆藏的唯一版本缙绅录全部录入后，将达到至少 500 余万条记录，其中《清代缙绅录集成》的数据占到 280 万条左右。目前收集的缙绅录的目录及录入进度如下：

① 在此感谢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张荣馆长对查阅和录入工作的批准及其同仁陈芳、张虎等人的帮助为我们提供了 11 个乾隆年间的珍贵缙绅录版本；感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王成志博士的帮助。

表 2　缙绅录（含民国）馆藏、时间分布及录入进度

公元	年号	年	春	夏	秋	冬	公元	年号	年	春	夏	秋	冬	公元	年号	年	春	夏	秋	冬	公元	年号	年	春	夏	秋	冬
1661	顺治	18					1769	乾隆	34		6			1819	嘉庆	24	4				1869	同治	8	1		4	1
1720	康熙	59					1770	乾隆	35	8			6	1820	嘉庆	25		▒		5	1870	同治	9	1	1	1	1
1721	康熙	60					1771	乾隆	36					1821	道光	1	13				1871	同治	10	1	1	2	2
1722	康熙	61					1772	乾隆	37					1822	道光	2					1872	同治	11	2	1	1	2
1723	雍正	1					1773	乾隆	38			12		1823	道光	3	12		6		1873	同治	12	4		2	1
1724	雍正	2					1774	乾隆	39		5			1824	道光	4		■			1874	同治	13	1	1	1	1
1725	雍正	3					1775	乾隆	40				8	1825	道光	5	14				1875	光绪	1	4	■	■	12
1726	雍正	4		1			1776	乾隆	41					1826	道光	6	12		■	13	1876	光绪	2	10	2	■	▒
1727	雍正	5			14		1777	乾隆	42			■		1827	道光	7	▒	5	6	13	1877	光绪	3	4	1	1	1
1728	雍正	6					1778	乾隆	43	13		10		1828	道光	8		12			1878	光绪	4	4	2	1	1
1729	雍正	7					1779	乾隆	44					1829	道光	9		4	13		1879	光绪	5	1	4	1	1
1730	雍正	8					1780	乾隆	45					1830	道光	10	7			1	1880	光绪	6	4	4	4	8
1731	雍正	9					1781	乾隆	46					1831	道光	11				6	1881	光绪	7	1	2	8	1
1732	雍正	10					1782	乾隆	47					1832	道光	12	14			13	1882	光绪	8	4	4	4	1
1733	雍正	11					1783	乾隆	48	8	8			1833	道光	13		1		2	1883	光绪	9	4	4	4	12
1734	雍正	12					1784	乾隆	49					1834	道光	14	1	1	4	2	1884	光绪	10	4	1	1	12
1735	雍正	13					1785	乾隆	50	13		3	13	1835	道光	15	2	8			1885	光绪	11	1	1	1	4
1736	乾隆	1					1786	乾隆	51	12			8	1836	道光	16		1	1	1	1886	光绪	12	2	1	1	2
1737	乾隆	2					1787	乾隆	52					1837	道光	17	14		1	6	1887	光绪	13	1	1	5	1
1738	乾隆	3				6	1788	乾隆	53	■		13	10	1838	道光	18	2	1			1888	光绪	14	5	1	2	1
1739	乾隆	4					1789	乾隆	54					1839	道光	19		1		8	1889	光绪	15	2	1	1	1
1740	乾隆	5					1790	乾隆	55	3				1840	道光	20		12	1	1	1890	光绪	16	1	2	2	1
1741	乾隆	6		6			1791	乾隆	56					1841	道光	21			4		1891	光绪	17	2	2	2	4
1742	乾隆	7					1792	乾隆	57	2				1842	道光	22	1	12	2	1	1892	光绪	18	1	2	1	1
1743	乾隆	8					1793	乾隆	58	2				1843	道光	23	6			6	1893	光绪	19	1	1	1	1
1744	乾隆	9					1794	乾隆	59					1844	道光	24	4			4	1894	光绪	20	4	1	1	2
1745	乾隆	10	14				1795	乾隆	60					1845	道光	25	3	1	1	13	1895	光绪	21	1	1	1	1
1746	乾隆	11					1796	嘉庆	1	1		2		1846	道光	26	2			2	1896	光绪	22	1	1	1	1
1747	乾隆	12					1797	嘉庆	2	12			▒	1847	道光	27		1	1		1897	光绪	23	2	1	1	1
1748	乾隆	13	1				1798	嘉庆	3	12		■	■	1848	道光	28	13	1	4	1	1898	光绪	24	1	4	1	1
1749	乾隆	14					1799	嘉庆	4	13		13		1849	道光	29	13	1	2	2	1899	光绪	25	1	1	1	1
1750	乾隆	15					1800	嘉庆	5				■	1850	道光	30	10		2	13	1900	光绪	26	1	1	1	
1751	乾隆	16					1801	嘉庆	6		6		2	1851	咸丰	1		1	13	10	1901	光绪	27	1	4	4	1
1752	乾隆	17					1802	嘉庆	7		4		8	1852	咸丰	2	13		2	1	1902	光绪	28	1	1	1	1
1753	乾隆	18					1803	嘉庆	8	4				1853	咸丰	3	13	1			1903	光绪	29	1	1	1	1
1754	乾隆	19	13				1804	嘉庆	9	■		13	2	1854	咸丰	4	1		13	2	1904	光绪	30	1	1	2	1
1755	乾隆	20					1805	嘉庆	10		14	5		1855	咸丰	5	2		2	6	1905	光绪	31	1	▒	■	■
1756	乾隆	21					1806	嘉庆	11	■	■			1856	咸丰	6	1	1		5	1906	光绪	32	■	■	■	■
1757	乾隆	22		5			1807	嘉庆	12					1857	咸丰	7	2	13	1	1	1907	光绪	33	■	■	■	■
1758	乾隆	23		6			1808	嘉庆	13			12		1858	咸丰	8		4		1	1908	光绪	34	■	■	■	■
1759	乾隆	24					1809	嘉庆	14		13			1859	咸丰	9		1	12	2	1909	宣统	1	■	■	■	■
1760	乾隆	25	13			■	1810	嘉庆	15					1860	咸丰	10	4	4	1	10	1910	宣统	2	■	■	■	■
1761	乾隆	26			■		1811	嘉庆	16					1861	咸丰	11		13	13	13	1911	宣统	3	▒	1	1	1
1762	乾隆	27					1812	嘉庆	17			■		1862	同治	1	6	12	8	6	1912	民国	1	1		13	13
1763	乾隆	28				5	1813	嘉庆	18				12	1863	同治	2	4	6	13		1913	民国	2				
1764	乾隆	29	14				1814	嘉庆	19				1	1864	同治	3	4	2	2	2	1914	民国	3				
1765	乾隆	30	■			■	1815	嘉庆	20					1865	同治	4	13	■	6		1915	民国	4				
1766	乾隆	31			1		1816	嘉庆	21			99	■	1866	同治	5	■	2		13	1916	民国	5	4			
1767	乾隆	32	4	4			1817	嘉庆	22	■		14	■	1867	同治	6	■	▒	1	4	1917	民国	6	2		4	
1768	乾隆	33			■		1818	嘉庆	23					1868	同治	7	4	4	2	2	1918	民国	7				

说明：

■	已录入	8	日本东洋文库	17	南京图书馆
▒	录入中	9	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	18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1	《清代缙绅录集成》	10	上海图书馆	19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2	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	11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20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3	美国国会图书馆	12	中国国家图书馆	21	苏州大学图书馆
4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	13	北京大学图书馆	22	中山大学图书馆
5	美国华盛顿中国研究材料中心	14	清华大学图书馆	23	复旦大学图书馆
6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馆	15	南开大学图书馆	24	山东大学图书馆
7	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	16	吉林大学图书馆	99	其他图书馆

由表 2 可见，保留至今的清代缙绅录中，版本年代最早的是顺治十八年（1661）的《搢绅册》，其余大部分集中在清代中后期。根据研究组的不完全统计，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

庆年间分别有 1、1、3、43、21 个年代存有缙绅录①，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各朝则所有年代都有缙绅录可查。若按社科研究惯例以十年为单位统计现存缙绅录的年代分布，则可发现如图 1 所示，1660—1740 年间数据相对匮乏，其中 1670—1720 年没有数据；1740 年以后每十年都有 5 年以上有缙绅录存世，其中 1820—1910 年数据非常完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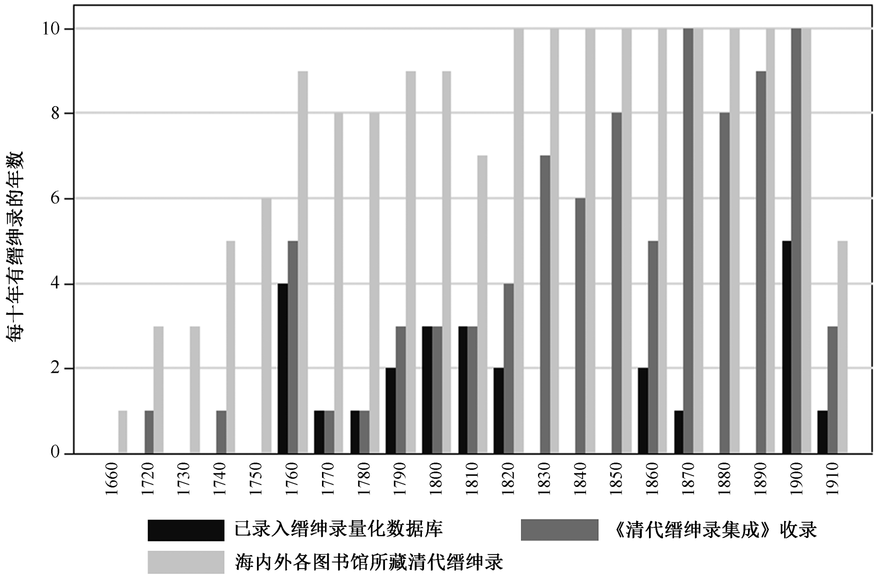

图 1　项目组收集的缙绅录长时段分布及录入情况（每十年）

说明：上图中缺失的年代，表示根据表 2 的缙绅录目录，该十年中没有可用的版本。

在录入的时段顺序方面，项目组最初对《清代缙绅录集成》中所收录乾隆年间的本子进行了试验性录入，录入员是与李中清—康文林研究团队长期合作的孙惠成、肖星和激扬。后考虑到清末的缙绅录种数和版本较为齐全，清晰度也较高，改为采用从嘉庆年间和清末向中间推进的方法。② 同时由另一名兼职录入人员继续完成了《清代缙绅录集成》中大部分乾隆年间缙绅录的录入。③ 目前的录入工作由七位录入人员分别从不同时段展开，新增的三位录入人员分别从道光初年、同治初年和光绪初年向后推进。④ 目前已录入和正在录入中的缙绅录可参见图 1，截止到 2016 年 8 月底，已录入 47 种，总计超过 650000 条记载，对应人数 140000 余人，预计将在两年内完成《清代缙绅录集成》的录入。

三、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的内容及数据质量评测

1、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的内容

尽管缙绅录被视为记录清代官员和官职信息的目录性专书，但是不同时段、不同版本的缙绅

---

① 所有季节不明的馆藏，包括部分顺治、雍正、乾隆年间独有的年代未列出在表 2 中。康熙年间的《搢绅册》藏于国家图书馆，因年代不详所以未记录在表 2 中。

② 具体做法，我们把光绪末年选择当一个时间点，由两位录入人员分别向前和向后录入，另一位录入人员从嘉庆元年开始录入。两种缙绅录之间的时间间隔越短，内容重复率越高，后一季的录入速度更快，保证了录入工作的有效推进。随着录入人员的增多，我们也在项目管理方面逐步完善了制度，形成了一套录入规则和查错方案。

③ 感谢研究团队的研究助理徐丹同学在课余时间进行的录入工作。

④ 2014 年，孙惠成、肖星、激扬、徐丹开始录入；2016 年初，新增赵宓、刘北簃、任玉百三位录入人员。2016 年中，新增陈蔚然。目前每位录入人员每一季（种）的录入时间约为三到四周，每人每月至少完成 14000 条记录。

录体例和内容上都有变化，而且对旗人和民人官员信息的记载也有很大差异。因此，我们在表3中对已经录入的数据进行了分组比对，从旗民对比，时间对比，以及版本差异三个维度比较不同信息内容的完整程度，以便对数据质量有初步的理解。

清代缙绅录是以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机构为线索，按照职位大小排列每个机构中的官员和吏员的姓名和官职名称，名下往往会标明地名（户籍或学籍，或二者兼有）、旗分、出身（主要是科名信息）、身份（宗室、觉罗、世袭等）、干支（科名获得时间或铨选时间等）、铨选方式、字号、加级等各种信息，录入人员严格按照原文录入。① 表3将量化数据库的主要变量分组列出，并对已经录入的数据，按照旗人民人两种身份、乾隆嘉庆道光及同治光绪宣统两个时段、官刻坊刻两种版本这三种分组方式对比数据信息的完整度，并做简单介绍。

表3　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信息完整度对照表②

	旗民对比（%）		时段对比（%）		版本对比（%）	
	民人	旗人	乾隆至道光	同治至宣统	官刻本	坊刻本
姓	92.69	6.85	77.06	70.63	70.44	75.37
名	93.10	97.78	97.12	92.29	92.94	95.20
官职	97.72	81.64	93.32	94.52	95.54	92.80
机构一	99.31	97.88	98.90	99.04	99.05	98.93
机构二	80.35	77.76	80.87	79.06	81.88	77.98
机构三	3.57	11.06	3.64	6.31	6.80	4.00
旗分	0.00	99.49	23.22	22.34	22.86	22.53
出身	78.98	45.45	64.09	75.93	76.38	67.10
人省	68.75	1.89	54.63	52.79	51.98	54.79
人县	87.36	0.18	72.38	64.39	62.12	72.00
铨选年	47.34	6.98	65.88	20.56	7.91	63.53
铨选方式	47.47	7.10	65.98	20.71	7.97	63.72
总计（条）	504 119	148 865	253 239	399 745	298 120	354 864

说明：1、“机构一”、“机构二”、“机构三”中的机构，是指官吏隶属的政府机构，一、二、三不代层级从属关系，仅为区分缙绅录记录的不同机构③；2、少数官吏名下会有两个地址信息，格式通常为“XX籍或XX人”，我们全部将其录入。以人省、人县等和籍省、籍县作为表头，进行区分。由于空间限制，表1仅列出“人省、人县”数据信息。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原始文档中省的信息单独列出，较为明确，府厅州县目前未区分。

由表3可见，量化数据库的主要信息包括姓、名、官职、机构、旗分、出身、身份、地址、铨选方式等，核心数据完整，为我们探讨官员仕途与官制变迁提供了丰富、详尽的大数据支持。

姓名和职官信息的完整性是定量分析官员仕途的前提，由表3可见，缙绅录作为职官信息手册，民人和旗人名字的完整度分别为93%和98%左右，官职完整度分别为98%和82%。由此可见，缙绅录文献为官员仕途研究提供了核心基础数据。

考试与财富是进入官员群体的两条路径——即正途与异途，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缙绅录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强大支持，由表3可见，有出身记录，即科举出身记录的民人官员和旗人官员的比例分别为79%、45%。缙绅录文献记录的科名信息，称谓众多，既包括进士、举人、

① 并非所有人的名下信息都是一致的。例如，如果是旗人，往往会有旗分信息，来自奉天地区的旗人，有时也会标注奉天或盛京等地理信息。如果是皇族或世袭身份，也会标注。如果是民人，则会有籍贯信息，小部分人则有双重地址，可能包括籍贯和考籍。

② 关于表1信息“完整度”的说明。缙绅录原文偶有职官的姓名空缺，但名下信息仍然完整的情况，或者有职官姓名，但其他信息缺乏的情况。我们完全遵循原文录入。因此，表1最末的总计行的数字，是各列信息的总条数，完整度百分比则是各种信息数量与各列信息总量的比例计算而来的。

③ 录入人员对机构名称的录入是根据缙绅录材料的排版决定的，不对机构之间的层级关系加以判断。最初录入工作进行时，我们也尝试过默认机构之间的从属关系，但是发现这样处理会造成史料的误读，并对使用分析数据、理解材料带来困扰，为保持数据库信息与原材料的一致性，我们采取上述的处理方案。

贡生、监生、生员等笼统的科举功名称谓，也包括廪贡、增贡、附贡、岁贡、拔贡、优贡、恩贡、附贡、廪监、增监、附监、例监、附生、增生、廪生等。还有一些与出身相关的信息，如保举、武举、议叙等称谓混在其中。科名、捐纳与官职的关系十分复杂，部分科名只能通过捐纳获得，因此出身一栏的信息对比较正途与异途官员的仕途是非常有价值的。

旗民之分是清代重要的政治边界，对国家官员系统的影响至关重要。缙绅录文献对旗人和民人官员的记录有着不同特点，让我们很容易将两者区分开来。根据表 3，具体说来，旗人姓名记录由于满族有“称名不举姓”的传统，故而姓氏信息较少，但名字信息完整度达到近 98%，此外，旗人都有明确的旗分记录。由此可见，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为探讨旗、民身份对于官员资格的获得和升迁的影响提供了强大的数据支持。

表 3 的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信息完整度比较，也为探讨官刻本和坊刻本的内容差别提供了新的方法。在姓、名、官职、机构、旗分等关键数据上，坊刻本和官刻本的数据完整度并无明显差别。关于出身的记载，官刻本的记录比坊刻本多出近 10%，但“铨选方式”、“铨选年”等信息方面，官刻本的记录接近 8%，而坊刻本高于 63%。

官刻本和坊刻本在铨选信息的完整度方面相差悬殊，可能和官刻本的体例变化有关系。官刻本从光绪三十一年冬的版本开始，不再记载铨选信息，目前原因待考。研究组已经录入的官刻本多是光绪末年及以后的版本，无铨选信息。而光绪三十二年的坊刻本仍然有铨选信息，似乎仍然延续以往的传统。此外，目前录入的坊刻本，多是光绪三十一年以前的。因此，表 3 显示的官刻本和坊刻本在铨选信息方面的差异，也可能是不同时期的版本风格造成的，随着录入工作的拓展，我们将继续关注铨选记录的变化。

2、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中职官姓名的唯一性分析及相邻年代数据连接

我们希望清代缙绅录提供时间上连续的职官记录，可以追踪个人的仕途生涯，而个人信息的追踪连接依靠的是姓名信息以及来源省、县（府州）或旗分。姓名的唯一性，即是否重名或同名会影响到数据连接的准确率，我们对已经录入的职官姓名分民人和汉军旗人、旗人（满洲、蒙古）二组，对每季中同一姓名出现的次数进行了考察。

表 4　缙绅录中官员姓名的唯一性（已录入部分）

同一姓名出现次数（每季）	民人和汉军旗人（%）	旗人（满洲、蒙古）（%）	总比例（%）
1	94. 23	65. 90	88. 05
2	4. 75	18. 60	7. 77
3	0. 65	7. 79	2. 21
4	0. 19	3. 59	0. 93
5	0. 18	4. 13	1. 04
总比例	100	100	100
总数（按记录）	480 822	134 104	614 926

说明：这里统计的姓名的唯一性是指相同的姓名在同一季缙绅录中出现的频次。

缙绅录量化数据库对官员季与季之间的可追踪性是由官员姓名的唯一性决定的。从表 4 可以看出，民人和汉军旗人的姓名重复率很低，94% 的记录中姓名在每一季的缙绅录中都只出现了一次。而根据我们的考察，4. 75% 在一季中出现两次的汉人姓名中，绝大部分是由于同一官员有兼任的职务，因此在缙绅录中不同的机构名单里出现。相比之下，满洲、蒙古旗人因为没有特定的姓氏记录，名字的重复率较高。由此可见，可以追踪的民人职官数据还是比较可观的。

从目前的录入情况来看，1900 年以后的数据比较完整，我们尝试进行了季与季之间的数据连接，详见图 2。

由图 2 可见，清末十年的职官变动剧烈。缙绅录量化数据库目前已经录入光绪三十一年冬到宣统二年秋的所有年代和季节的连续数据，我们尝试追踪数据“记录”和官员在每一季出现的情况。从上图可以看出，在清末短短的四年多时间里，官员的流动性很大，20% 的民人官员在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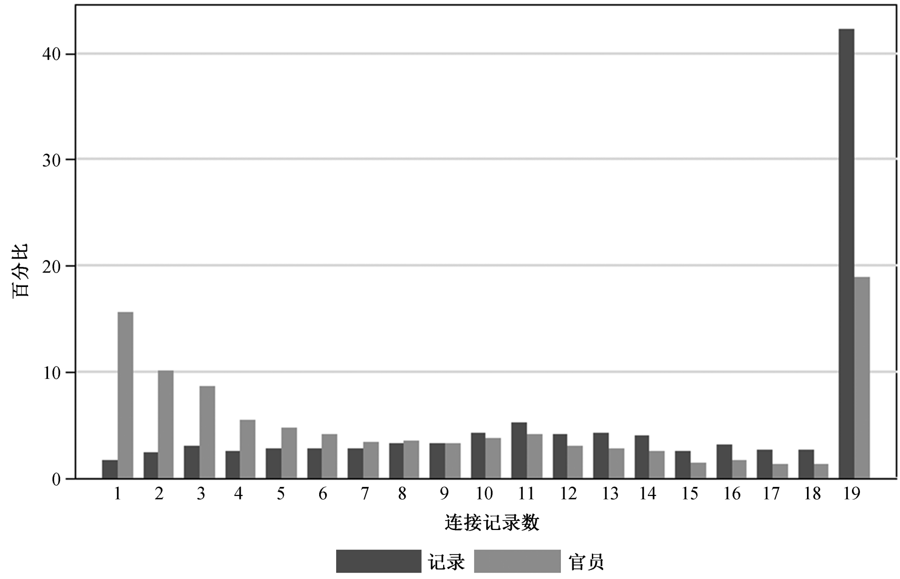

图 2　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季与季之间连接结果（1905—1910）

说明：上图的分析仅包括了非旗人官员。

绅录中仅仅出现了一次，而 17% 左右的民人官员在这 19 季缙绅录中都能追踪到。官制改革与社会动荡可能是高流动率的主要原因，但如此之高的流动率，还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由此可见，大数据分析帮助我们发现问题，引导我们深入发掘更多的历史真相。

四、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与其他数据库的匹配和整合

前文中提及，缙绅录量化数据库录入完成后，可以通过和其他量化数据库的匹配补充官员的更多信息，为全面地研究清代官员的社会来源、流动、仕途迁转和官制变化等课题服务。表 5 是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与其他团队搜集的相关材料所包含内容的比对，以及部分初步匹配尝试的结果。我们对已经录入的缙绅录量化数据与四种不同的量化数据库进行了匹配的尝试，即 CBDB 题名录数据、《清代朱卷集成》[①] 的进士数据、《川楚事例文武官生名次全录》数据、清代玉牒数据。对已经录入的部分数据，我们通过人的姓、名和籍贯进行了匹配。从匹配结果来看，成功率较高。通过数据匹配，补充其他背景信息，大大扩充了量化数据库内容的丰富性，为研究更多的课题打下基础。

（1）对官员中式名次信息的补充

我们首先尝试了与 CBDB 量化数据库的匹配。CBDB 量化数据库共有 34320 条记录，主要是明清两代有科名的士人，其中清代数据共有 29846 条，科名为进士的记录有 27525 条，其余为包括武进士、翻译进士、举人、荫生在内的其他士人记录。目前录入的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中有 46538 条记录和 CBDB 团队的量化数据库匹配，对应 9048 人。而根据其他学者估计，清朝文科常科考试 112 次，取中进士 26849 名，1740 年之后有 17604 名[②]。虽然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中有少量的武进士和制科进士，但数量不多。根据目前缙绅录录入数据与 CBDB 的匹配情况估计，缙绅录量化数据库约覆盖了近二分之一的常科进士。对于进士而言，中式名次对他们仕途的升迁速度是有决定性影响的，通过与 CBDB 量化数据库中进士信息的匹配，可以补充中式名次等关键信息，对于研究进士群体的仕途有重要意义。

---

① 进士的数据来自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感谢该项目组分享数据。
② 江庆柏编著：《清朝进士题名录》（上册），中华书局，2007 年，第 3 页。

（2）对官员年龄信息的补充

官员的年龄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问题，但相关记载非常零散，缙绅录也缺失年龄信息。从表 5 可以看出，大部分与科举有关的史料，如乡试题名录、朱卷、乡试录、同年齿录等，都包含了年龄信息，如果缙绅录量化数据库可以与上述材料连接，就可以计算官员在职时的年龄。表 5 中提到的乡试录、乡试题名录、同年录、同年齿录等材料，一部分是厦门大学刘海峰及其团队多年来搜集到的各省乡试材料，主要提供的是与举人有关的重要信息。与乡试有关的举人史料数量庞大，根据刘海峰团队提供的目前所搜集的各省举人史料数量估计，可以补充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中约 3 万人的年龄信息。

我们也尝试与 CBDB 中录入的清代传记材料进行了匹配，初步结果显示，已录入的缙绅录量化数据中有 5543 人，能从 CBDB 量化数据库的 12852 人中匹配到出生日期，而 6573 人能匹配到死亡日期。从目前与李中清 – 康文林研究团队达成合作的团队和个人提供的各种史料的统计来看，清华大学版本的缙绅录量化数据中大约有四分之一左右缙绅录中的官员（10 万）有希望通过与其他史料量化数据库的连接匹配以补充年龄等信息。

（3）对捐纳信息的补充

研究组希望将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与捐纳名单匹配，探讨捐纳在官员仕途发展中的影响。我们将缙绅录量化数据库和张乐翔录入的《川楚事例文武官生名次全录》（以下简称全录）① 数据进行了匹配尝试，有 2241 名官员可以匹配到捐纳名单。由于《川楚事例文武官生名次全录》是嘉庆三年所载捐实缺资格的官生名单，而目前我们录入的仅有嘉庆元年春、嘉庆三年秋、冬两季、嘉庆五年冬四个版本与之时间上相近，很可能没有涵盖到足够多的官员。另外，另一种类似史料为《豫工二卯事例满汉文员官生名次录》，记录的是道光年间捐纳名册，计划在未来录入为量化数据库。捐纳对官员仕途的影响十分复杂，我们希望将定量分析方法与制度史研究相结合，在捐纳与官员仕途发展方面有新的发现。

（4）对家庭背景信息的补充

家庭背景信息是研究社会代际流动的关键内容。朱卷提供了包括妻子、子女、叔伯、堂兄弟、始祖至父母辈的姓名、功名和官职，甚至包括族中旁系叔伯兄弟的相关情况。目前与我们团队合作的 CBDB 团队以及厦门大学的郑若玲都录入了朱卷材料。CBDB 团队目前仅录入了进士朱卷，共计 1579 人，但是目前仅有姓名而无籍贯信息。我们仅利用姓名与目前录入的缙绅录量化数据进行匹配，有 1311 人可以匹配成功。包含类似信息的史料还有乡试同年齿录，其内容不及朱卷详尽，但也包括了三代以内祖父母的姓名和妻子、子女姓名等信息。表 2 中河南的乡试史料来自天津大学程伟的搜集，已经录入的数据部分可提供 4000 多人的家庭背景信息。

朱卷和乡试同年齿录还包含了考官的详细信息，朱卷更是包括了受业师、肄业师、受知师的姓名、籍贯、功名、任官情况，与缙绅录匹配后可用于社会关系网络的研究。部分可以补充家庭背景信息和师承关系的信息，用于研究仕宦生涯的代际传递和人际网络关系。由上述可知，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与朱卷、齿录等履历材料的匹配，将会补充官员更多背景信息，我们将在此基础上尝试用定量分析的方式呈现家族、地域、师承、科名、年龄与财富等各种因素对官员群体仕途的影响。

（5）旗人身份信息的补充

旗人是清代官员中的重要群体，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与玉牒的匹配，将可以更为细致地分析来自宗室、觉罗的皇族宗亲在京师中央机构的官员系统中的地位和仕途发展。李中清 – 康文林研究

① 关于《川楚事例文武官生名次全录》数据的介绍，详见 Lawrence L. C. Zhang，“Legacy of Success：Office Purchase and State – Elite Relations in Qing China”，*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 73 No. 2（December 2013），pp. 259 – 297.

团队在数年前已经完成了对清代玉牒量化数据库的录入，两个量化数据库目前匹配成功的人数是 4818 人，我们希望可以深入理解世袭的政治身份对官员仕途的影响。由上述可知，缙绅录量化数据库的创建，及其与题名录、玉牒等量化数据库的匹配连接，将为清代官员群体研究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多种数据史料的运用与连接工作，使我们能够将家族、地域、师承、科名、年龄与财富等多种信息整合到官员群体的研究中，这与众多学者的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

表 5　清朝不同科举与官员史料内容比对及与缙绅录量化数据库匹配结果

史料	地域	人数/记录（史料包含）	人数/记录（已录入）	人数/记录（目前匹配）	中试名次	中试年龄	出生年月	任官情况	家庭背景	授业师、肄业师等
清华大学清代缙绅录集成	全国	400000/2800000	145770/652984					✓		
CBDB 题名录	全国	34420	34420	9048/46538	✓					
CBDB 朱卷进士	全国	1635	1579	1311/8600			✓		✓	✓
厦门大学朱卷举人	全国	5186	4869	待匹配			✓		✓	✓
厦门大学乡试录	河南山东江西顺天	≈22400	≈2200	待匹配		✓				
厦门大学乡试题名录	广西福建云南广东陕西贵州四川江南浙江	≈8400	待录入		✓	✓				
厦门大学乡试同年录					✓					
厦门大学乡试同年齿录	河南	≈4800	≈4000		✓		✓		✓	✓
其他乡试题名录 同年录/同年齿录	江南	5623	5623			✓				
川楚事例文武官生名次全录	全国	10978	10978	2241/7123			✓	✓	✓	
豫工二卯事例满汉文员官生名次录	全国	≈1100	待录入	待匹配			✓	✓	✓	
玉牒	全国	83256	83256	4818/66106	✓	✓	✓	✓	✓	

说明：分号“/”前的数字表示人数，“/”后的数字表示对应的记录条数。因缙绅录是按季出版，所以连接匹配的结果中，单一的个人会对应多条连续的记录。

五、基于缙绅录量化数据库的官员群体定量分析举例

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不仅可以帮助学界了解官僚制度，还可以让学界认识更鲜活的历史。中国的官僚制度可以追溯到秦朝，迄今已有 2200 余年的历史，但除了帝王将相，绝大部分中低层官员的资料荡然无存。缙绅录是中国乃至世界唯一保留至今记录了连续性、大规模官员信息的史料，现存约 500 万条官员记录，对应约 40 万官员，以此建立的量化数据库，将深化目前对于清代官制与官员群体的认识。

我们对目前录入的缙绅录量化数据库进行了一些描述性的统计分析，下面举几例进行说明。中国有句俗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中国人相信“学而优则仕”，但缙绅录量化数据库的分析结果表明——事实可能并非如此。清代民人虽然在科举考试中占有优势，但在中央机构中，旗人还是占有绝对的优势，详见表 6。

表 6　缙绅录量化数据六部衙门按品级分类的旗人官员比例（1906 年以前）

六部	1－3 品（%）	4－6 品（%）	7－9 品（%）	未入流（%）	总数（条）
兵部衙门	60. 80	55. 87	87. 42	99. 93	5 625
刑部衙门	53. 49	38. 16	77. 78	100	10 287
吏部衙门	58. 21	52. 12	86. 26	100	4 632
工部衙门	61. 80	59. 41	87. 49	99. 95	7 657
户部衙门	62. 99	52. 89	86. 10	100	12 173
礼部衙门	61. 95	70. 78	91. 09	99. 74	6 393
总数	1 169	25 277	10 337	9 984	46 767

说明：数据是按“记录”统计的。

以往史学界对清朝中央机构的研究往往关注制度史领域，且由于材料限制，对官缺制度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较高品级的官职上，缙绅录量化数据库的建立，将为学界更系统全面地了解清代官职机构的人员构成提供更详实的实证材料。以往研究通常认为，尽管旗人在中央机构中占到了三分之二的官缺，但汉人官员仍占到一席之地，来自八旗的满洲、蒙古旗人、汉军旗人和民人共同组成了京师中央机构的官员。而通过对缙绅录数据的初步统计可以发现，实际上在六部衙门中，七至九品和未入流的较低品级官职基本全由旗人担任。由表 6 可见，具体的分析中，六部衙门除刑部之外，七到九品官员中旗人都占到了 90% 左右的高比例，而主要由笔帖式、库使等组成的未入流官职，基本 100% 全由旗人垄断。而四到六品的官职中，六部衙门之间旗人的比例也有较大差异，刑部衙门中旗人官员比例尤其少，仅占约 38%，而礼部衙门中旗人官员比例高达 70%，其余各部中等品级官员旗人的比例则都在 50% 到 60% 之间。六部衙门中一到三品官员中旗人官员的比例则与以往研究的结论较为一致，且各部门差异不大，占到 60% 左右。上述差异性和一致性的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但是缙绅录量化数据库的建立无疑将为学界探究和考察清代各级机构官员群体的构成提供绝佳的材料。

为了考察旗人身份对官员仕途的影响，我们展开了进一步的分析，列出了民人的科名情况，而旗人是作为一个整体①和民人的不同科名的群体进行比较。需要说明的是，表 7 主要考察不同出身群体官员的品级分布情况，如下：

表 7　旗人与民人官职品级分布（百分比）

出身	1–3 品（%）	4–6 品（%）	7–9 品（%）	未入流（%）	无品级（%）	非官职（%）	未确定（%）	总比例（%）	总数（条）
旗人	3.76	34.15	31.15	17.01	1.98	0.79	11.16	100	148 865
生员	0.32	13.91	65.35	8.98	0.76	0.72	9.97	100	11 295
举人	0.29	11.46	82.78	0.02	0.58	0.14	4.74	100	89 533
进士	3.26	38.15	44.93	0.17	3.58	0.64	9.27	100	50 235
贡生	0.15	10.74	82.78	1.5	0.49	0.14	4.2	100	97 344
监生	0.07	12.82	52.34	28.4	1.75	0.26	4.35	100	132 987
荫生	1.98	58.64	19.44	2.39	3.21	1.17	13.16	100	3 426
其他	1.21	13.39	30.67	17.1	26.06	0.31	11.26	100	13 340
无出身	1.31	15.96	47.05	17.14	3.82	0.5	14.23	100	105 959
总比例	1.44	19.92	54.40	13.20	2.42	0.43	8.20	100	
总数	9381	130 053	355 244	86 187	15 796	2 797	53 526		652 984

说明：1、民人的科名有生员、举人、进士、贡生、监生、荫生和其他，不能归入以上类别的翻译、武举、武童、参领，和其他出现频次较少的类别都归入“其他”，无出身的民人也单独列出为“无出身”。2、表格中的数据是按“记录”统计的。

从表 7 可以看出，旗人群体和进士群体成为高品级官员（1–3 品）的比例分别是 3.22% 和 2.86%，也就是说，旗人身份比民人进士身份更容易进入高品级官员群体。

值得注意的是，财富与家庭背景对于官员仕途的影响非常巨大。如果将不同科名出身的民人官员记录，按照其群体进入前 6 品的比例由高到低排队，依次是荫生、进士、生员、监生、举人、贡生，比例分别为 60.62%、41.41%、14.23%、12.89%、11.75% 和 10.89%。② 也就是说，虽然荫生出身的官员记录很少，仅有 3426 条，但其一旦进入官僚体系，多半能进入高级官员的行列，其比例甚至远远超出进士出身的官员。可能由于恩荫或难荫，有着特殊的前辈恩泽，荫生进入高品级是有绝对优势的；生员进入官僚体系的人数不多，有 11295 条记录，但有 14.23% 的比例进入前 6 品，比举人出身的官员记录比例还高；监生出身的官员是非常特别的，该群体的记录数量在民人官员中位列第一位，进入前 6 品的比例亦超过举人和贡生。监生科名一

---

① 由表 3 可知，目前录入的缙绅录中，旗人有 46% 的记录是包含出身信息的，但由于旗人参加科举的试卷和中额都有独立的体系，与民人不同，所以此处将旗人作为整体进行描述性的分析。

② 目前还有一些官员的品级没有确定，随着数据库的完善，比例可能略有变化。

般是捐纳而来，这部分人的仕途发展远胜举人，说明财富因素在官员仕途发展中的作用非常重要。

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清朝政府提供了科举、财富和身份（旗人身份、恩荫和难荫）三种不同的仕进途径，虽然这三种方式亦相互交错，但三条主线还是相当清楚的。初步的分析结果表明，依靠特别身份和财富成为官员的群体，一旦踏入官僚系统，往往会升迁得更快。

以上的分析虽然非常简略，已经揭示出一些非常有趣的话题，研究组会继续进行深入讨论。

不同职官品级等级，旗人与不同科名出身的民人所占的比例也非常引人关注，详见表 8：

表 8　官员品级与旗、民分布（百分比）

出身	1－3 品（%）	4－6 品（%）	7－9 品（%）	未入流（%）	无品级（%）	非官职（%）	未确定（%）	总比例（%）	总数（条）
旗人	59. 59	39. 09	13. 05	29. 39	18. 68	42. 05	31. 03	22. 80	148 865
生员	0. 38	1. 21	2. 08	1. 18	0. 54	2. 90	2. 10	1. 73	11 295
举人	2. 77	7. 89	20. 86	0. 02	3. 30	4. 36	7. 92	13. 71	89 533
进士	17. 48	14. 73	6. 35	0. 10	11. 38	11. 51	8. 70	7. 69	50 235
贡生	1. 56	8. 04	22. 68	1. 69	3. 05	4. 86	7. 63	14. 91	97 344
监生	1. 02	13. 11	19. 60	43. 82	14. 74	12. 58	10. 80	20. 37	132 987
荫生	0. 72	1. 54	0. 19	0. 10	0. 70	1. 43	0. 84	0. 52	3 426
其他	1. 72	1. 27	1. 15	2. 65	22. 01	1. 47	2. 81	2. 04	13 340
无出身	14. 75	13. 01	14. 03	21. 07	25. 6	18. 84	28. 17	16. 23	105 959
总比例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总数	9381	130 053	355 244	86 187	15 796	2 797	53 526		652 984

表 8 是从品级分类来看旗人和不同出身的民人的分布比例。可以看到旗人和监生占到了缙绅录官员记录总数的很大比例，分别为 22. 8% 和 20. 37% 。而真正通过科举获得进士科名的官员，只占到总记录条数的 7. 69% 。在一至三品的高品级官员中，进士在民人的诸多科举出身中占了绝对性的优势，达到总记录数的 17. 48% ，而旗人则占到 59. 59% 。举人和贡生出身的民人在七至九品的较低品级官员中比例相对较高，分别占总记录数的 20. 86% 和 22. 68% 。未入流官吏群体，则以监生和旗人为主导，其中监生占到 43. 82% ，旗人占 29. 39% 。

六、李中清－康文林研究组的数据公布与未来计划

研究数据共享的规范起源于自然和生命科学领域，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亦越来越有影响力，各种基金和学术期刊也逐渐要求研究者提供原始数据。促进数据公开的最初动因是检验已经发表的分析结果，但近年来学界广泛意识到共享数据还有其他用途：其一是量化数据库往往有巨大的分析潜力，其他的研究者可以用来进行完全不同的课题研究，这或许与数据库建立者的初衷不同，但无疑增加了量化数据库的使用效率；其二是跟其他量化数据库结合，构建覆盖范围更大的量化数据库。例如，不同国家的同一个题目的追踪调查数据或是人口普查数据可以合并起来，构建跨国性的大型量化数据库。另外，同一国家的不同方面的数据可以合并，例如调查问卷和行政数据，构建跨领域的量化数据库。目前，美国各个学科都有专门的数据存储机构，以社会科学为例，始建于 50 余年前的政治和社会科学研究校际联盟（ICPSR），成立于密歇根大学，保存了约 9000 余种数据。

现在，学界普遍意识到数据库的重要意义，特别是构建成适用于统计分析软件的量化数据库，“它既能够丰富、完善我们对微观人类历史和行为的认识，还能帮助构建更为可靠、踏实的宏大叙事，促进我们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进一步认识”。①

---

① 梁晨、董浩、李中清：《量化数据库与历史研究》，《历史研究》2015 年第 2 期。

由于量化数据库构建及数据公开的过程非常复杂，充满挑战，一些学者发布数据库的贡献与其研究成果一样斐然学界，李中清－康文林研究组在不违反隐私权和所有权的前提下，积极倡导并践行数据公开。自 2010 年以来，通过 ICPSR 中心向学界公开了系列的中国多代历史人口量化数据库（CMGPD）及详尽的使用指南，包括近 300 万可以连接的家庭记录和 50 万姓名唯一的个人记录。目前已经发布的数据库有两个，其一是中国辽宁多代人口量化数据库（CMGPDLN），它是李中清与康文林历时 20 余年建立的中国清代人口数据库，涵盖 1749 年至 1909 年 150 万条记录，为 26 万个人数据；其二是中国双城多代人口量化数据库（CMGPDSC），涵盖 1866 年至 1913 年 135 万条记录，为 10.8 万个人数据。另外，还有双城地区 1870 至 1906 年 1.9 万块次土地记录。[①] 此外，研究组在建的清代玉牒（CMGPDIL）量化数据库[②]，涵盖 1640 至 1935 年 15 万个记录，将于适当时机公布。需要说明的是，所有量化数据库都为可进行数据分析的量化数据库。

我们计划于 2018 年开始发布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主要是基于《清代缙绅录集成》的 280 万条数据。[③] 研究组将同时发布缙绅录使用指南，开办系列的数据研究工作坊。此后，随着缙绅录量化数据库的扩展，每年会定期发布新的数据。我们欢迎感兴趣的学者进行研究或者参与合作，并期待基于大数据的量化研究方法为清代以来的历史研究开辟崭新的思路。

（感谢南京大学副教授梁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后研究员董浩对本文多方面的帮助。）

References

Li Guoqi.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Personnel Transition in Qing Local Governanc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Executive Yuan, Published by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Executive Yuan, 1975.

Ch' u Tungtzu. *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 ing*, translated by Fan Zhangxin et al, Beijing: Law Press China, 2003.

Wang Zhonghan. "Summary of the Qing Bureaucratic System," *Wang Zhonghan' s Collected Papers on Qing*, Volume 4.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4.

Wang Zhiming. *Studies on Bureaucratic Institutions During the Reign of Yongzheng*. Shanghai: Shanghai Guji Press, 2007.

Zheng Ruoling.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and Society*. Wuhan: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7.

Jiang Qingbai (ed.). *Jinshi Timinglu of the Qing* (vol. 1),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7.

Tsinghua University Library.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 *Qingdai Jinshenlu Jicheng*. Zhengzhou: Daxiang Press, 2008.

Chang Chung－li. *The Chinese Gentry*.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2008.

Ho Ping－ti.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Translated by Xu Hong. Taipei: Lianjing Press, 2013.

Wu Yue. *China' s Juanna and Society*. Nanjing: Jiangsu People' s Publishing LTD, 2013.

Du Jiaji. *The Bureaucratic System and Governance of the Qing Banner*.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5.

Hu Heng. Did*Imperial Authority Reach Below the County? The County Governanc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nd the Governance of Grass-roots of Society*. Beij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5.

Pan Guangdan & Fei Xiaotong.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Social Science*, Vol. 4 No. 1 (1947).

Zhang Yingyu. "Research on the Qing Jinshenlu", *Wenxian*, No. 1 (1984).

Kan Hongliu. "Explora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Contents, Feature and Value of the Qing Jinshenlu", *The Qing*

---

① http://www.icpsr.umich.edu/icpsrweb/ICPSR/series/265

② 前文中提及，清代玉牒数据库已于数年前录入完成，数据库使用指南的编写工作仍在进行中。

③ 本文提到的其他学者录入的数据库，不在发布的范围内。

History Journal, No. 2 (2012).

Wang Linlan. Ascribed Status and the Attainment of Bureaucratic Posts of the Qing Imperial Lineage: 1644 – 1911. Ph. D Dissertation, Peking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2012.

Liang Chen, Dong Hao, James Z. Lee. "Quantitative Database and History Research", *History Research*, No. 2 (2015).

Liu Zhengyun. "Publication of Jinshenlu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Its Quarterly Submission for Imperial Review", *Journal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Vol. 87 No. 2 (June 2016).

Benjamin A.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Benjamin A. Elman. *Civil Examinations and Meritocrac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Benjamin A. Elman. "Social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 via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0: 1 (Feb, 1991)

Lawrence L. C. Zhang. "Legacy of Success: Office Purchase and State-Elite Relations in Qing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73 No. 2 (December 2013).

Thomas A. DiPrete. *The Bureaucratic Labor Market: The Case of the Federal Civil Service*. Vancouver: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2013.

The Qing Jinshenlu Database: A New Source for the Study of Qing Officialdom

REN Yuxue (History Departmen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renyuxue@ sjtu. edu. cn)

CHEN Bijia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chenag@ connect. ust. hk)

HAO Xiaowe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haoab@ connect. ust. hk)

Cameron Campbell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mcam@ ust. hk)

James Le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qljzl@ ust. hk)

This essay introduces a major new database, based on the *Jinshenlu*,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officialdom and Chinese society during the last imperial dynasty, the Qing, who ruled from 1644 to 1911. For almost two centuries, the Qing government and private publishers published a *Jinshenlu* every three months with the names and particulars of all civil, and sometimes military, officials. We are transcribing 400 of these quarterly editions dating from 1661 to 1917 into a database, beginning with 206 containing approximately 2 800 000 records of 400 000 officials republished by the Tsinghua University Library as the《清代缙绅录集成》.

Based on our initial transcription of 652 984 records of 145 770 officials from 47 editions, we demonstrate the potential of these data for the study of official careers. We contrast bannermen, who had their own appointment system, with civil officials who passed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and other officials who purchased their appointments. Moreover, we demonstrate that these *Jinshenlu* records can be linked to records in other systematic sources on the Qing imperial lineage, on examination degree holders, and on office purchasers. The resulting combined data provide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to understand Qing political and social elites.